

革命年代的“头”等大事

头发，虽然只是普通的人体皮肤组织的一部分，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头发却承载了太多的文化、习俗甚至是政治内涵。哪怕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头发有关的故事也很多，非常值得我们细细探究一番。

短发成为追求革命的外在标志

在古代，头发一般是不能随便修剪的，剪发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头发往往成为时代风气转变的象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剪发或剪辮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通俗易懂的口号。1912年3月，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辮文》，要求“凡未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剪辮令刊布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剪辮运动的社会浪潮。

这次社会浪潮也深深地印在了青年毛泽东的脑海中。时隔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提到：“在剪辮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由此，剪发或剪辮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标志。

头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头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重

要的关系是：发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外在标志。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当时，他穿着朴素，剃了个平头。一位苏联同志对此的评价是：“延年不但思想无产阶级化，而且相貌也无产阶级化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辛亥革命前的大辮子相比，短发或平头是新的发型式样，并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标志。

与此同时，女性剪短发则成为追求革命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普通的家庭女性还是基本上留长发和保留发髻的。据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曾志回忆，1924年，她考入湖南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学校里面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非常活跃，也有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那时提倡剪短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基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生们的齐耳短发的发型被称为“革命头”。

从头发长度窥见革命的艰辛

有短发，就会有长发。头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重要的关系是：头发的长短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革命的艰苦卓绝。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和环境的险恶，很多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精心修剪发型，以至于头发有时候会比较长。比如，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根据地，陆续采访了一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将领。他是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

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

更早的时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过程中，“毛委员”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头发很长。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曾志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毛泽东的情形：“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同样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张平化这样回忆见到毛泽东的情形：“只见屋里有一张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旧门板搭起的床，上面正睡着一个人，身穿粗布衣裳，头发留得很长。”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所熟知的标准发型，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留着比较长的头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由此看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不重外表的豁达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革命工作的艰辛。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长发可以反映革命生活的艰苦卓绝，短发同样也可以反映这一问题。长征时期，由于军情紧张，行踪不定，更没有什么时间保持身体和住处的卫生，红军战士的身上、头上往往都长满了虱子。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地区后，生活条件有了基本的保障，身上的虱子消灭了，但头发里的却不容易清理干净。无奈之下，很多红军战士甚至包括女同志在内，都把头发剃掉了。当时，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女同志都曾经这样做过。革命的艰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特定环境下发挥掩护作用

短发可以成为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标志，长发也可以在革命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头发与革命的第三个重要关系是，它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起到化装掩护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女革命者都一定是齐耳短发。

在革命军队中，女兵一般留着短发，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工作，情况则有所不同。短发或平头既然成了革命的象征，那么它也有可能给革命者带来危险。刘英在自述中提到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长沙城内流传着一句恶毒的话“巴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所谓的“巴巴头”就是指妇女的发髻，而“瓢巴鸡婆”是当地的俗语：意思是秃尾巴鸡，专门用来侮辱剪了短发的女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抓住剪了短发的女性就要枪毙。

有鉴于短发可能给女革命者带来生命危险，在城市中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女同志通常会留有长发。道理很简单，当周围的普通女性都留着长发或者盘着发髻的时候，留短发的女性就会非常显眼，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这时候，留着长发对自己来讲就是一种很容易做到的额外保护措施。据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李文宜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一个规定，不允许女学生剪短发，目的就是为了返回中国后便于化装。回国后，留着长发的女同志一般会梳一个假发髻。为了革命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就必须学会融入周围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上述事例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据《党史博采》

李清照有个很“横”的父亲

李格非是北宋著名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他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南宋尹穉曾云：“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足见其博学多才。李格非以善论文知名，其“为文以诚”“为文以横”的特点无不彰显着他的真性情。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尽显“横”态，在这篇散文中介绍了洛阳名园十九处，借描绘洛阳园林优美的景色，暗中寓意兴亡征兆。他目睹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营私，以小见大，借唐讽宋，由园林的兴废联想到洛阳的兴衰，由洛阳的兴衰又联想到国家的兴亡，由此大

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又叹：“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他抨击当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又担忧国家的命运，展现出了强烈的家国忧患意识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其文之“横”，个性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李格非在山东郓州教书期间，生活很清贫，当时的郓州知州见他平日里甚是节俭，日子过得清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李格非说：“老李啊，你这一天过得太苦了，不如兼个职拿双份俸禄，减轻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李格非听后，立刻拒绝：“我做好本分工

作，该拿多少就拿多少，多一分钱我都不要！”绍圣元年，李格非作为受知于苏轼的守旧派，并未受到革新派迫害，反而受到新党的青睐，委派新任，李格非不肯妥协，不攀附权贵，离开汴京，前往北方的广德军当了一名通判。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李格非做官很有原则，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他在官场上的“横”，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李格非在江西上饶做官时，当地有一个专门给人算命的道士，经常妖言惑众、危言耸听，把百姓唬得一愣一愣的，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在当地影响极坏。这个道士出

门时特别喜欢乘车。有一次，李格非乘车出门办事，刚好路遇了乘着马车出行的道士，两辆车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李格非得知对面坐着的是这个道士，当即命令手下把道士从车里拖出来，拉到路边叫他跪下，历数他的罪状，把他痛打了一顿，并驱逐出境。

耿介正直、守正清廉，做人做官讲究原则，敢于反抗权贵，是李格非真性情中流露出来的“横”。李格非的“横”，是对真理无畏的追求，对正义不懈的坚守，即便面对强权压迫，亦能挺身而出，捍卫心中的道义与理想。

据《滕州日报》